



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 成果

刘震 / 著

周易勿已寸读

帛書易傳

丙申夏
劉震



上海圖書出版社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刘震 / 著

周易巴守读

帛書易傳

丙申劉大鈞



上海圖書出版社
上海科學技術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易》导读——帛书《易传》 / 刘震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 6

(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哲学卷)

ISBN 978-7-5439-7031-1

I. ①周… II. ①刘… III. ①《周易》—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9634 号

责任编辑：张树

特约编辑：张红义 张亮 张照华

《周易》导读——帛书《易传》

刘震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90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7031-1

定价：55.00 元（精装）

<http://www.sstlp.com>

序

20世纪70年代，是简帛发现的重要时期，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马王堆汉墓竹简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和阜阳双古堆汉简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掘出土的，简帛研究也由此进入了繁荣时期。随着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的相继发现或出土，简帛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其中，郭店楚简的出版至为关键，使得简帛学上升为一门国际显学，并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回顾四十年来简帛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马王堆帛书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出土资料之一，而帛书《周易》经传又是其中的亮点。

从汉代以来，出土《周易》类或三《易》类资料约有八次。前三次，发生在西汉宣帝、西晋太康和民国三个时期。第一次，据王充《论衡·正说》篇，是“河内女子发老屋而得逸《易》一篇”。至于此篇逸《易》叫什么，王充本人也不清楚，但是《隋书·经籍志》具体指明为今本《易传》之《说卦》《序卦》《杂卦》三篇。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戴震、郭沫若、李镜池等人的肯定和继承^①。但《隋志》的说法难以成立，那篇逸《易》还是应当推定为《杂卦》。第二次，在魏襄王墓发现了所谓“汲冢竹书”。据《晋书·束晳传》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这批竹书包含了与今本《易经》相同的本子以及《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和《公孙段》（二篇）。其中，《易繇阴阳卦》“与《周易》略同”，

^① 戴震：《东原文集》卷一《周易补注目录后语》，载《戴震全书》（修订本）第六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23—224页；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页；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00页。

繇辞则异”；《卦下·易经》即《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说《阴阳说》，《晋书·束晳传》谓其“似《说卦》而异”；而《公孙段》大概与帛书《繆和》《昭力》的性质相似。此外，汲冢竹书还有“《师春》一篇”，“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对于证明《左传》的早出颇有效力。第三次，在东汉太学遗址发现了熹平石经《周易》残石。熹平石经对于认识《周易》古本和校正今本的文字略有帮助。

后五次发生在近四十多年的时间里。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和六篇《易传》类著作；1977年夏，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了汉简《周易》；1993年3月，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竹简《归藏》；1995年5月，上海博物馆收藏了楚竹书《周易》；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了楚简《筮法》和《别卦》。此外，记在甲骨文、金文中和战国楚简（包山、天星观、葛陵）上的六位数字组也很重要，是当初提出和讨论“数字卦”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基本材料。

从重心来看，四十年来的出土易学研究主要表现在数字卦与《周易》卦爻画之来源问题、出土早期《周易》文本、帛书《易传》和楚简《筮法》《别卦》上。“数字卦”概念及其问题是张正烺先生在1978年12月正式提出来的，它是一次重大的学术突破。张先生不仅将这些书写在甲骨文、金文和竹简材料上的六位数字组定性为“易卦”“筮卦”或“数字卦”，而且还由此深入地思考了《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问题。现在看来，“数字卦”概念的使用仍然是恰当的，但需要作出区分和限定：“数字卦”不过是“易卦”的一种，它是以“筮数”的形式表现（书写）出来的“筮卦”。“数字卦”概念虽然古本无之，但是在当代学术史上仍有其单独命名的意义。由于清华简《筮法》的出土，《周易》卦爻画的构成及其来源问题终于可以得到解决。近二三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帛书、汉简和楚竹书《周易》的阴阳爻画都分别作“八”“一”两个数字的形状，但是它们为何作此形状，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而根据《筮法》则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在《筮法》简所有卦例中，其与阳爻相应的数字“一”一律表示数字“七”，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周易》的阴阳爻画乃是由“八”“七”这两个数字变化而来的。而进一步，我们看到七、八、九、六在《周易》文本中都直接得到了安排：

“七”“八”为爻画，而“九”“六”为爻题。而对四象数目作出这样的安排，与大衍筮法（五十数的揲蓍法）是完全吻合的。总之，楚简《筮法》对于彻底解决《周易》卦爻画的数字来源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于帛书《周易》经传，在笔者看来，学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帛书《周易》经传的整理和释文。帛书六十四卦的释文公布较早，且质量很好，自1984年首次公布以来改动不大。不过，这个本子不分上下篇，六十四卦的构成原理及卦序与今本迥异。学者普遍认为帛本六十四卦的构成和卦序，其原理见于帛书《衷》篇“天地定立（位）”一段文字（即今本《说卦》第三章）。最近，我们又看到了清华简《别卦》篇，竹简所展示的六十四卦构成及卦序图，其原理与帛本正同。另外，帛书《易传》的释文从20世纪90年代首次发表以来即多次得到订正和改进，最近的一个版本载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其二，帛书《周易》经传的校释。张政烺、李学勤、韩仲民、张立文、刘大钧、廖名春、邓球柏、赵建伟、连邵名、刘彬、严灵峰、黄佩荣和池田知久等先生在这一方面均有论著出版，鄙人亦曾撰有《汉帛书与楚竹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目前，尽管在校注上学界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今后还需要作总结和提高。其三，帛书《易传》的文本和思想研究。除校释外，对帛书《易传》的文本研究还包括帛书《二三子》的文本构成、今本《系辞》与帛本《系辞》《衷》《要》的文本关系、帛书《衷》是否由两篇合成、帛书《繆和》《昭力》二篇的分合及此二篇之“先生”是否为“孔子”、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以及帛书《易传》是否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和《易传》的儒道性质等问题。与此同时，学界不但分别研究了帛书《易传》六篇的思想，而且从总体上研究了其哲学、政治及易学所特有的思想。其中，解释观念、阴阳说、乾坤说、卦气说和易例（解易方式）等得到了重点关注。另外，从宏观上来看，比较今、帛本《易传》的文本和思想，这非常有利于梳理今本《易传》的来源，还原此一时期《易传》的多样性，阐明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以上所述，乃出土易学资料及其重要学术问题的概况。这些资料和问题构成了刘震写作《帛书〈易传〉卦爻辞研究》及相关论文的背景。目

前，研究帛书《周易》经传的论著很多，而刘震副教授所著《周易导读——帛书〈易传〉》一书，即为其中优秀者之一。本书是作者在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再作修改和提高，并编入其他相关论文的成果，凝聚着作者多年的心血和心得。该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即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第二部分是作者近十年来已发表之易学研究论文的集结，最后一部分为附录。刘震博士的学位论文，我很早就拜读过了，当时只粗知其善，但是知之不深，知之也不够真切。近年，由于在帛书《周易》经传的研究上稍有论著，鄙人可以略谈一下自己对于这部书稿的读后感了。就第一部分，我有如下四点浅陋的看法。

第一，该书第一部分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眼光独到，令人耳目一新。该书既不是单独研究帛书《周易》的经文，也不是单独研究帛书《易传》六篇之某个篇目的文本和思想，而是从帛书《易传》中钩稽和归纳出易卦的卦爻辞，然后再作文本比较和思想分析。这种进路不但必要，而且非常新颖，是完全值得赞赏的。而为了更好地展开对帛书《易传》的引经和释经研究，作者又将第一部分分解为《究天人阴阳之变的〈二三子〉与〈衷〉》和《明学聚问辩之道的〈繆和〉与〈昭力〉》两节。不过，作者并没有考察帛书《系辞》《要》二篇的引经和释经情况，而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帛书《系辞》引经、释经之例不在少数，总计有十七条之多，但是为何作者在书中没有考察和分析它们呢？依鄙见，其中存在两个彼此相关联的原因：其一，帛书《系辞》已见于今本《易传》，且在文本上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其二，作者考察帛书《易传》引经、释经的目的，乃是为了比较其与今本的不同。至于为何作者没有具体考察帛书《要》篇的引经和释经，刘震博士认为此篇帛书大体上“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解《易》文字”，中间虽然涉及《否》《鼎》等卦，但“与今本《系辞传》的部分内容相一致”。于是他便将考察和论述的重点放在《二三子》《衷》《繆和》和《昭力》这四篇帛书上了。笔者很赞成刘震的这一选择和处理。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呈现帛书《易传》文本的本来面貌，作者大体上是以帛书原本的顺序来展开论述的。

第二，该书第一部分在资料的利用和裁剪上颇为恰当，且在本质上是一种比较研究。笔者看到，作者先抄录并对照今本《周易》卦爻辞和帛本

《易传》的引经文本，然后一边引述今本《易传》、王弼《注》和帛书《易传》的解释文本，一边作出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在此，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要选择王弼《注》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呢？刘震对此认为，即王弼《注》是汉魏时期流传下来的最完整的本子，且从学派上来讲属于汉代的古文易学，与帛书《易传》能够形成很好的比较。因此，他说：“将帛书、今本与王弼三者作一个综合性的比较，并期望借由这样的方式，对汉代《易》学与帛书《易传》上的诸多疑问，能有一个基本的回答。”这就是该书在资料运用和论证上的目的。

第三，该书仔细辨析了今、帛本《易传》对经文（卦爻辞）的解释，大都比较平实和公允。关于《乾卦》九二的含义，《文言传》说为“君德”，帛书《二三子》说为“君子之德”，刘震认同帛书的解释，并说：“《文言传》中的‘君德’是对‘君子之德’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或者是由抄写者的笔误与错解，或者是随着诠释对象的变化而作出的改变。”关于《晋卦》的旨意，《彖传》《序卦传》说为“进阶”，后世进而说解为“臣子之晋升”，刘震指出，帛书《二三子》的解释主旨则在于“圣王安世”，这是很不同的。至于《繆和》对《涣卦》九二的解释，刘震认为，帛书其实将“时”“福”“賁”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体现出孔子对于人生的一种深刻思考，但不是宿命论的。此外，作者还认可《繆和》的“先生”身份为“孔子”的观点。以上这些看法或解释，我都是赞成的。该书的精彩之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四，该书有很好的问题意识，有些观点甚至发前人之所未发。其中，刘震博士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观点，即他认为，帛书《易传》早于今本而成书。他说：“帛书《易传》极有可能成书于秦代之前，也就是诸侯统治期间，而今本《易传》的成书则要在秦代之后，甚至是在汉初。”其依据主要有二：一者，帛书《易传》对于《周易》卦爻辞的解释是比较原始的，保留了先秦时对爻辞的原始解释，其文字较为古朴，内容也比较单一，而今本《易传》则有明显的增删、修订和润饰的痕迹；二者，帛书《易传》很少受到宗法制度或宗法礼仪的影响，喜欢以史释《易》，而今本则有浓重的宗法思想，连阴阳观念也带上了宗法的意义，作者甚至推测《文言传》等今本《易传》篇目“受到汉代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很有可能

其在汉代时有一次官方的修订，而这种修订不仅是文字上的，更为重要的是内容与思想上的修改”。我认为，刘震的这一观点颇具创新性，富有启发意义。他的论证深入而具体，反复推阐，的确发人之所未发，值得重视。因为今、帛本《易传》的写作时代是一个重大的基础性问题。

以上，是鄙人对该书第一部分的一些粗浅看法，未必全面，未必得当，但愿能替读者诸君指点一二。至于书稿的第二部分，则汇集了刘震副教授近十年来研究早期易学，特别是出土易学的六篇论文，它们是《孔子与〈易传〉的文本形成之管见》《谈〈周易〉中的“福”》《清华简〈筮法〉中的“象”“数”与西汉易学传承》《清华简〈筮法〉与〈左传〉〈国语〉筮例比较研究》《〈易传〉圣人形象初探》和《帛书〈易传〉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孔子与《易传》的关系问题是老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很纠结的问题；而楚简《筮法》乃最新资料，研究难度很大。在这些文章中，刘震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或有启示意义的观点。他认为，西汉易学今文学派有今义和古义之分，帛书《周易》经文属于古义一系，而帛书《易传》属于今义一系；在先秦时代，孔子弟子及后学并没有将《周易》视为儒学的主要经典而加以详究，这一点在孟子和荀子那里可见一斑。关于《筮法》“象”“数”与西汉易学的传承关系问题，刘震说：“清华简《筮法》中的筮法与龟卜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其后则成为了孟喜、京房所传之纳甲筮法。”关于筮数“八”，他说：“在占筮体系取象拟天的过程中，‘八’所代表的‘阴’与方位之中的东方、季节之中的春季，乃至八卦之中震卦逐渐关联在一起。它的爻象表述逐渐被卦象表述所取代。所以才会出现《左传》《国语》筮例之中‘八’字难以理解的情况。”关于帛书《易传》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就学术上而言，帛书易学在时代上弥补了汉代易学的断层，特别是由战国时期到西汉这一时期的易学史，使得我们有机会了解易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转化。”我非常赞成刘震的这一判断，帛书《易传》的学术价值确实在于此处。

刘震副教授勤于思考，善于提出问题，他的许多论点具有创新价值，值得鄙人参考和借鉴。他的导师蒙培元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在儒学，特别是在宋明理学研究上贡献巨大。而刘震善于分析问题和提出新见，这大概是受到了蒙先生的影响吧。同时，刘震专心从事易学研究并多

有创见，则与其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家学有着直接关系。他的父亲是当代易学大家刘大钧先生，刘先生不仅学术成就卓著，而且易学事业发达。而刘震最终选定研究帛书易学，笔者揣测，这不但因为帛书《周易》经传研究乃是近三十年来最为重要的易学课题之一，而且也是深入研究易学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吧。近年，笔者屡闻刘震副教授善于讲学，在中国政法大学弘扬大易和讲授国学，声名远播，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为之击节赞赏不已。

《周易》为五经之首，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而在当代，弘扬大易精神、传播《周易》文化的责任十分重大。我衷心希望刘震未来更上一层楼，在《周易》文化的弘扬和《周易》学术的研究上取得辉煌的成绩！

是为序。

丁四新

乙未年仲冬初十序于武汉大学国学院

序

目 录

帛书《易传》卦爻辞研究	(1)
一、究天人阴阳之变的《二三子》与《衷》	(2)
《乾》	(2)
《坤》	(14)
《蹇》	(28)
《鼎》	(30)
《晋》	(33)
《屯》	(35)
《同人》	(37)
《大有》	(41)
《谦》	(43)
《豫》	(44)
《中孚》	(46)
《小过》	(47)
《恒》	(48)
《解》	(53)
《艮》	(55)
《丰》	(58)
《涣》	(59)
《未济》	(61)
二、明学聚问辩之道的《繆和》与《昭力》	(63)
《涣》	(64)
《困》	(67)

目

录

1

《丰》	(68)
《蒙》	(70)
《谦》	(73)
《归妹》	(76)
《恒》	(78)
《比》	(80)
《益》	(81)
《谦》	(82)
《睽》	(83)
《明夷》	(85)
《观》	(86)
卿大夫之义	(89)
《师》	(89)
《大畜》	(89)
国君之义	(92)
《师》	(92)
《比》	(92)
《泰》	(92)
出土文献与秦汉易学史	(98)
孔子与《易传》的文本形成之管见	(99)
秦火之惑	(100)
《周易》的传承与《易传》的形成	(102)
对钱穆先生的回答	(110)
谈《周易》中的“福”	(113)
小人之福	(116)
首福	(117)
重福	(118)
贲福	(120)
求福	(123)
清华简《筮法》中的“象”“数”与西汉易学传承	(127)

清华简《筮法》与《左传》《国语》筮例比较研究	(138)
《易传》圣人形象初探	(150)
帛书《易传》的价值和意义	(163)
综录	(165)
帛书《易传》研究现状综述	(165)
帛书《易传》释文	(165)
帛书《易传》学派归属	(167)
帛书《易传》成书时代	(170)
帛书《易传》诸篇的内容	(173)
帛书《易传》解《易》方法	(177)
帛书《易传》之中卦名、卦爻辞与特有范畴	(180)
帛书《易传》所引用之卦爻辞	(184)
马王堆帛书《易传》原文	(186)
马王堆帛书《二爻子》	(186)
马王堆帛书《繫辭》	(189)
马王堆帛书《衷》	(194)
马王堆帛书《要》	(198)
马王堆帛书《繆和》	(200)
马王堆帛书《昭力》	(207)
参考文献	(209)
关键词索引	(216)

帛书《易传》卦爻辞研究

在帛书《易传》中，有不少针对《周易》卦爻辞的解读，其内容涉及不同卦象，但由于其体例并非如今本《彖传》等那样完备，因此，其内容中除去对于《乾》《坤》两卦的所有文辞加以解读之外，剩余所涉及的卦爻辞解读有的稍有缺失，有的缺失较多，其义难明，然其虽是只言片语，却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笔者将从帛书《易传》中关于卦爻辞的解释入手，对比今本《易传》以及后世注《易》大家的解读。一则探究《周易》经文之真实含义，二则挖掘帛书《易传》的成书年代。从帛书《易传》自身内容而言，我们发现除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外，帛书《易传》其他篇章中，《要》篇开始有大量的缺字，后面则主要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其内容也是针对孔子对于易学研究的态度问题，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解《易》文字，中间所涉及的《否》《鼎》等卦则与今本《系辞传》的部分内容相一致。因此，笔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剩下的四篇各有特色的帛书《易传》上。《二三子》篇属于比较完整的解《易》作品，其在格式上采用提问与孔子回答相结合的形式，内容上则是针对卦爻辞的解释，没有其他的内容。《衷》篇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乾》《坤》两卦展开的比较翔实的论述。《繆和》篇前半部分乃是采取问答体的形式，由学生提问而以“子曰”作为回答，内容除了对于卦爻辞的解释之外，往往与君子行为、君王行为等相结合，显然是孔子以《周易》中卦爻辞所代表的含义来教育学生。同时，我们在问答中可以发现，学生的提问常常具有相当的针对性与诘难性，这说明提问者本身对于《周易》也有着相当的理解。后半部分则是以史解《易》，形式上是一个历史事件加上一个卦爻辞加以注解，由于没有“子曰”，因此难以判断这些内容是何人所言。《昭力》篇篇幅较短，也是采用问答体，但内容上不是直接的解释卦

爻辞，而是引用卦爻辞解读了所谓的“卿大夫之义”与“国君之义”，这又与前面的《二三子》《衷》《繆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关于帛书《易传》卦爻辞的研究主要就是围绕这四篇释文展开，由于帛书《易传》四篇使用了不尽相同的解《易》方法，所以在论述的过程之中，我们将打破卦爻辞本身的结构，而依据帛书《易传》的篇章展开探究。

一、究天人阴阳之变的《二三子》与《衷》

2

《二三子》是帛书《易传》中内容相对完整的一篇，其所涉及的卦爻辞众多，详见下表，其中关于《乾》《坤》两卦的部分，我们将结合《衷》篇的内容一起解读，然后将重点分析一下剩余部分的卦爻辞，帛书的解释是否与今本《彖传》《象传》等内容相一致。同时，今天所见到的注《易》版本，最完整的就是三国魏王弼的本子，王弼从学派上来看是属于汉代古文易学的，而汉代的今文易学多已失传，帛书出土之后，有的学者提出其内容就属于汉代的今文易学，所以，我们也将王弼的观点补充进来，将帛书、今本与王弼三者作一个综合性的比较，并期望借由这样的方式，对于在汉代易学与帛书《易传》上的诸多疑问，能有一个基本的回答。

《乾》①

今本②与帛书《周易》皆以《乾》卦开始，表现了《乾》卦在《周易》中的特殊地位，因此《乾》卦的注释与解读多为学人重视，特别是《易传》中的《文言传》，其内容专解《乾》《坤》两卦，既突出了《乾》《坤》作为“易之门户”的重要性，亦更为完整地描绘出《乾》《坤》的微言大义。而帛书《易传》中也有专门关于《乾》卦爻辞的解释，对比今本《易传》中关于《乾》卦的解释，今、帛本《易传》两者在数量上基本相当，

① 帛本作《键》卦，因与今本《乾》卦均表示☰卦，故统称为《乾》卦，以下所引用诸卦卦名皆使用今本卦名。

② 本书中所言“今本”，泛指今传世本《易传》，其与王弼、孔颖达三者所言内容皆引自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

格式相仿。在内容方面，两者既有相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差别。那么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是否能通过二者的对比，可从中发现一些今文易学的蛛丝马迹呢？让我们依下面文字作一次初步探析。

今本 初九：潜龙勿用。

帛书 初九：寢龙勿用。

《文言传》曰：“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从文字来看，今本强调的是一种“无闷”的遁世思想，那么什么人在何种情况下才会遁世呢？自然是圣人在帝王无道之时。因此，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道：“此夫子以人事释‘潜龙’之义，圣人有龙德隐居者也。……虽逢险难，不易本志也。”^①这显然对“有龙德隐居者”持肯定的态度。同样在《文言传》中，又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从字面上来看，这两段文字对“潜龙”的理解根源于时局的变化，在今本《易传》作者的视野下，当政治清明时，君子应当积极用世，辅佐君王；当君主无道时，君子则潜藏民间，即如《系辞传》所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而帛书《易传》中解释“潜龙”之义也使用了人事的比喻，帛书中提到：“易曰：寢龙勿用。孔子曰：龙寢矣而不阳，时至矣而不出，可胃寢矣。大人安失矣而不朝，謫猷在廷，亦猷龙之寢也。亓行灭而不可用也，故曰寢龙勿用。”^②值得注意的是，在释“寢”字时，“时至矣而不出”之语令人困惑。众所周知，《周易》是一部“时”的哲学，《文言传》谓“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帛书中亦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③，可见，《文言传》与帛书的作者都十分重视“时”的概念，特别是帛书，将“时至而动”作为君子的特征，而此处却言“时至矣而不

①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②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易学集成》第三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5页下。

③ 同上书，第3027页上。

出”，这显然否定“潜龙”是君子的行为，对其持批判的态度，视之为一种不可取的行为。这与《文言传》释“潜龙”之旨有所不同，帛书中的“元行灭而不可用也”，更为明显地阐述“勿用”之意为“不可用也”，而在后面的行文中，帛书《易传》又提出：“易曰潜龙勿用，元义潜清勿使之胃也。子曰：废则不可入于谋，朕则不可与戒。忌老不可与亲，缴〔老〕不可予事。”^① 所谓的“废”“朕”“忌”“缴”，皆为不可为用之情态。因此，在帛书作者看来，“寝龙”是对日常中一种人的描述与概括，这种人的特点即是“时至矣而不出”，是不可用的“废”“忌”“朕”“缴”之人，显然，这样的人不仅不属于君子之列，而且对于一名君子而言，要特别小心身边有这样的人。这与《文言传》中解释“潜龙勿用”而引喻君子在不同处境下的有为无为，显然有着很大的差别。

今本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帛书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文言传》：“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文言传》对于九二爻的解释，依然以“人事”释之，而“《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这句在格式上是一个特例，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以其异于诸爻，故特称‘《易》曰’。‘见龙在田’，未是君位，但云‘君德’也。”^② 依此断之，此爻异于诸爻者，在于“君德”二字，因为依爻位说而言，九五爻为君王之位。九二爻与九五爻相应，则是指那种没有国君之位，却有国君之德的人，如《周易正义》中所言“舜渔于雷泽，陶于河滨，以器不窳，民渐化之是也”^③；“夫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④。帛书《易传》对九二爻同样有着新的解读，主要有两段，第一段是：“卦曰：见龙

^① 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易学集成》第三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9页下。

^②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3页。